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沉沦到荣光(1931-1945)——抗日战争全记录 /
李继锋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723-325-1

I. 从... II. 李... III. 抗日战争-史料-中国-摄影集
IV. K265.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1217号

从沉沦到荣光(1931-1945)

——抗日战争全记录 / 李继锋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张 涛 陈莎莎
特约编辑: 于 懋
装帧设计: 梁 雷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政编码: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570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325-1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931

东亚历史的分水岭	1
本年大势	1
“九一八”之夜	8
石原们的野心	13
江桥的抵抗	16
制造北平天津骚乱以扩大侵略	19
东北之殇	23
狂热的岛国	30

1932

南与北：孤独的抵抗	35
本年大势	35
锦州、哈尔滨被占 东北沦陷	44
鼎盛期的东北义勇军	49
十九路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57
伪满洲国的出现	73
国际联盟的介入	77

1933

城下之盟	84
本年大势	84
山海关的尴尬	92
热河的耻辱	95
长城鏖战	101
日本退出国联	112
困境中的东北义勇军	116
飞行热	119



1934

中国：岛国的后院？	122
本年大势	122
溥仪：从“执政”到“皇帝”	129
新生活运动	132
叶木花之死和藏本英明失踪案	136
中东铁路的买卖	140

1935

谷底	143
本年大势	143
华北的危局	153
“一二·九”运动	162
进退维谷的国民党	167

1936

殊途同归	171
本年大势	171
西安事变	176
日本的“二二六”事件	180
救国会“七君子”	183
华北：演习中的对抗	188
绥远的捷报	192

1937

到了最后关头	199
本年大势	199
卢沟桥的见证	210
平津沦陷	213
上海：四个月的恶战	222
八路军东进和平型关大捷	233
山西：日军的泥沼	236
南京的陷落	241



1938

以空间换时间	244
本年大势	244
堡垒般的山西	260
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线作战	264
以水代兵的花园口决堤	274
保卫大武汉	277
晋察冀：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288



1939

积小胜为大胜	294
本年大势	294
胶着的正面战场	301
鲜为人知的冬季攻势	306
共产党武装的迅速成长	312
白求恩医生与战地救护	318



1940

窒息时刻	323
本年大势	323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336
张自忠的牺牲与宜昌失守	341
大轰炸下的重庆	344



1941

内与外	350
本年大势	350
皖南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冷冻	359
长沙：正面战场的焦点	364
敌后军民的困苦	367
租界：不再是避难所	371



1942

结盟后的远征	374
本年大势	374
三战长沙：盟军的唯一亮点	382
远征军入缅与蓝姆伽训练	386
敌后根据地：最艰苦的岁月	392

1943

光与影	399
本年大势	399
敌后根据地的复苏	409
湘西的常德会战	413
后方工业的困顿	417

1944

两条生死线	420
本年大势	420
大陆交通线与日军的“一号作战”	431
驻印军反攻缅北	436
滇西之战与中印公路的开通	442
敌后军民由守转攻	449

1945

永载史册的胜利	453
本年大势	453
苏联出兵东北	467
受降的荣光：从芷江到南京	471
战犯审判、日俘日侨遣返与战争赔偿	478

1935

1935

谷底

本年大势

20世纪30年代是喧嚣的，世界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人们难以忘怀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人们备受失业、饥饿和绝望的煎熬。乘乱而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欧洲，好战的狂吼让人们胆战心惊，黑压压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地球。人类面临思想、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完全剥夺的巨大威胁，只有苏联好像是世外桃源，经济建设在飞速发展，但那里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样严酷，不过，它的真相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广为人知。

在1935年的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国也同样流行，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日本侵略到共产主义运动，还多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内战。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抵达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观上，就像《大公报》的记者胡政之在《粤桂写影》中评价的：“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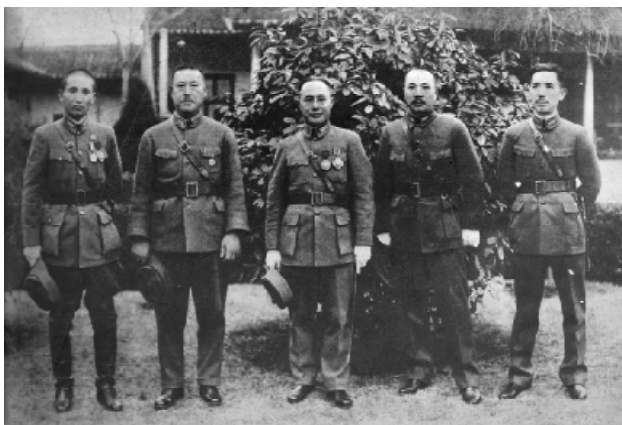
于其内在，胡适在《南游杂忆》里不客气地将广西与广州作了比较：“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祀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纪风



1935年初，中、日关系升为大使级关系。图为中国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中)向日方呈递国书。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图为1935年11月，红军第六军团占领湖南新化时的合影。



南京军方高级将领合影。图为何应钦(中)、张治中(左一)、唐生智(右一)等。

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但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使他们更加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湘江一战，亲历者至今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再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

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既有国民党的追兵，又有严酷的大自然，饥饿、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蒋介石在享受着胜利者的快乐，他不仅将红军逐出江南地区，而且让他的追兵开进了贵州、四川、云南等



1935年秋季，南京举行军事演习时的情景。当时德国顾问正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



广东军队进入贵州围攻红军。

西南省份。这些省份从袁世凯称帝失败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就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历届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些边远省份的将军们在红军过境时暴露了自己的虚弱和落伍，他们看到了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开进了自己多年的领地，既羡慕，又嫉妒，更害怕。弱小的贵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云南的龙云将军盛情接待蒋介石，四川的军阀们在门户洞开后也不敢怠慢蒋介石这位来自长江下游的“下江人”。

这年初，厄运连连的中国突然受到列强的恭维，英、美、日在对华投资上惟恐落后，争得面红耳赤。美国派来了经济考察团，日本的工商人士

来得更频繁。中国俨然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和远东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了。

1935年，整整一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迎来了小阳春。这一年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仿效。可是国人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预感到大祸临头。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但日本却毫不留情地断了南京政府的后路。南京政府为了满足日本，不惜粗暴地压制本国民众的反日舆论和情绪。当“闲话皇帝”事件发生时，《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被捕入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敦睦邦交令》的颁布更是异乎寻



因《新生杂志》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而发生中、日外交风波。图为因此事被捕的《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



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他在中央军撤离平津、河北以后，成为
平津、河北的实际控制者。

常，政府简直就是在声色俱厉地警告国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中国人只剩下保持缄默的自由。

1935年，整整一年，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有“新生事件”这样小题大做的精神折磨，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还有像“华北自治”等直接肢解华北的致命性的行动。日本终于真的在华北动手，南京胆怯了，从京、津、冀撤走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留下无依无靠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去和日本人周旋，当时的局势令人绝望，好像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夺取华北的步伐了。

几近疯狂的日本用行动证明：日本不但要东北，还要华北，甚至要奴役全中国。

这一年，使得那些对日本能“悬崖勒马”尚存在一丝希望的中国人感到了完全幻灭，结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

学的胡适便是其中一人。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两人对当时危机四伏的中、日关系同感惶恐不安。眼看着一场战争劫难就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知识人在拼命找寻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的行动不仅会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国交向来密切。中国虽占了数千年优势，却从未向日本派过一兵一卒。甲午战争带来了东亚新格局，日本把向中国大陆扩张作为国策，日本逐渐成为东亚的主宰，中国却变得羸弱不堪。日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孙中山——共和国之父，他的政治生涯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晚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24年底，生命之烛行将熄灭的孙中山曾经取道日本北上，在短暂的逗留期间，他对日本朝野发表忠告，告诫日本要做亚洲的干城，而不是欧美的鹰犬。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中国最有权势的军人和政治家——也曾想与日本化敌为友，甚至不惜以整个东北为代价。1934年底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即为明证。这篇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邻。它的精神完全是蒋介石授意的，从题目来看就可以想见蒋的心思，他不愿意与日本真正为敌。说他是亲日派也好，说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实无关紧要，他自信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这应该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军队里服役的经历。

和蒋介石一样，很多所谓亲日派都是留学过日本的，他们许多人都对日本抱着幻想。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军队的意志顽强、训练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风俗、精神和文化，许多日本人帮助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的日本人是他们的老师，有的是他们的同学，有的还是经济上的赞助者，也有的甚至成为了他们的私人朋友。没有到过日本的人，往往从日本当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到日本人凶狠、贪婪、心胸狭窄和狂妄的一面，而留学过日本的中国人还看到了日本文化优秀的一面，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自有它的道理，并不只是侥幸所致。但自认是通晓日本民性国情的人对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时反而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对于日本“改弦易辙”、“悬崖勒马”抱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凭自己与日本人的关系和私交可以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速率与路向，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胡适在中国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张与日本进行没有把握的战争，这从他1933年支持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后来又在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就能够看出来。所以，他完全是凭理智来考虑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虽然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失去理智。这一点，胡适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写给那些为数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说，胡适是中国人中温和与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论家，因为他意识到日本疯狂的对华侵略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即使这样的人，居然也责怪中国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拢，而不肯与同种的日本人亲近。

华北的命运考验着中国人的忍耐极限。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大声呼吁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声明发表在8月间，那个时候，国内的共产党军队正



1935年9月，南京步炮军事演习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听取军事演习情况介绍。

艰难跋涉在长征途中，等到达陕西北部，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便准备很快地融进反抗日本的大潮流中去。这支历经数不清磨难的红军队伍，意志坚强得举世无双，但在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弱小的。他们需要休养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定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将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内战的对手逐渐失去从事“剿共”内战的热情和意志。南方苏维埃时代的孤芳自赏、到处树敌的政策在党内受到了批评。

国民党仍然在“和”与“战”之间徘徊，但华北事变动摇了对日妥协政策的基础。自1932年以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一直在前台，成为举国公认的亲日派首领。1935年6月下旬，监察院对黄郛、殷汝耕等6人提出媚日卖国弹劾案，汪精卫本人也受到舆论日益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汪精卫推行妥协政策的严重警告。蒋介石此时还需要汪精卫为亲日妥协政策分谤，于是请汪精卫复职，汪精卫也就半推半就地重新视事。

但这年底，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个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权的成立，中国已经到了不是爆发就是死亡的临界点。11月3日，《大公报》的星期评论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五色旗重现通州街道。

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坚决抗日。

12月9日，一个凛冽的冬日，华北的数万学生走上了街头，这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呼应。

1935年，渐渐失去了华北主权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华北的危机使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人彻底撼动了，向日本妥协、忍让、讨好的政策也已经快走到尽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终于承诺，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关头，政府准备全面抵抗。从1935年底开始，无论有什么高尚的借口，内战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日本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把中国逼进无路可退的死胡同将迫使中国人焕发出求生的勇气，并找回共同对敌的智慧。1936年将验证这一点。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图为东北大学的学生走上了北平的街头。



第一任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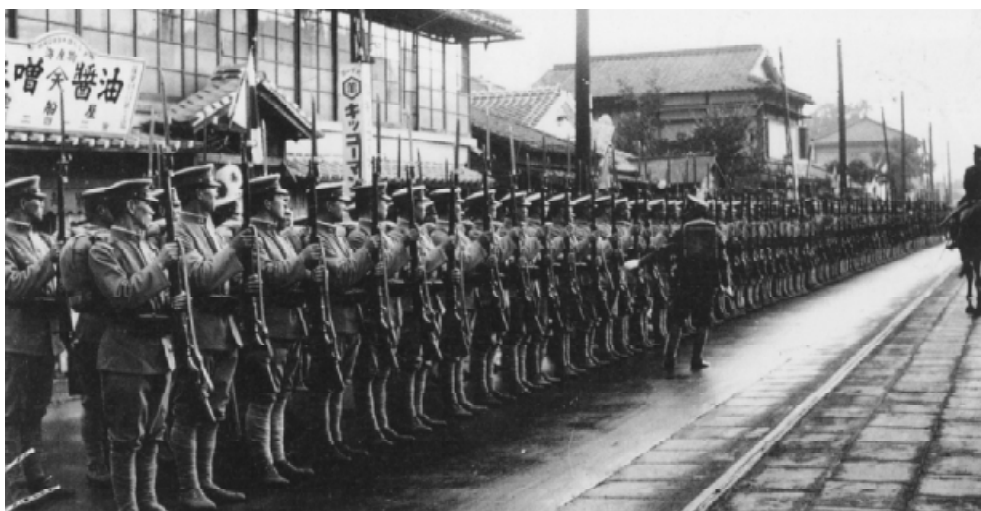
第一任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左)到中国上任，图为路过上海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会晤。



1935年驻苏大使颜惠庆(右二)与京剧演员梅兰芳(右三)、电影演员胡蝶(右一)等同船去苏联, 图为在甲板上留影。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吉明上任。



1935年日本陆军大演习, 天皇(骑马者)亲自检阅。



白银外流使中国经济陷入恐慌，图为上海码头上运出白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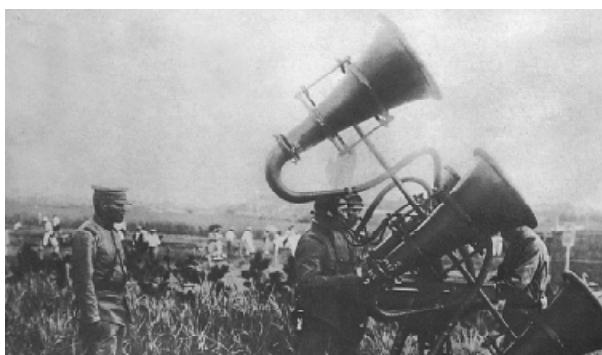
英国顾问李滋罗斯夫妇来华。李滋罗斯此行的使命是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



中国铁路建设对民生、经济与国防均有作用。图为1935年修筑江南



川黔公路筑路时的情形。



日本的防空演习。



1935年11月1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对日妥协外交全面动摇。



1935年底，主张反日的演说者在西北的一个城镇上公开演讲。

华北的危局

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这年4月间，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共同制定了“华北自治运动”的具体计划，并得到东京批准，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实施。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哈尔。

那时的察哈尔省是第二十九军的防区，军长宋哲元兼任省主席。他是山东乐陵人，1935年正好50岁。家境贫寒的宋哲元于1908年进入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在冯玉祥部服役，历任师长、总指挥、热河都统等职。中原大战后，西北军风流云散，



签订了《秦土协定》的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



在华日本海军军官会议。

剩下了残余一点军队随宋哲元到了山西，编为第二十九军。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次年率部在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创日军。这支有抗日传统的军队是日本人总想赶走的。

1935年6月5日，日本驻阿巴嘎旗（位于多伦西北）特务机关员大月桂等4人，自多伦乘汽车经张北前往张家口方向绘制地图。守卫城门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士兵将其拦住，查看护照。这4个日本人态度蛮横，欲强行通过，卫兵将他们扣留，送往军法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息事宁人，指示：“就放了吧！但是下不为例。”

但日方决定扩大事态，制定了“对宋哲元交涉要领”，限土肥原贤二两星期内完成。土肥原贤二公然声称：“关

东军将提最大要求，要宋主席去职，一三二师调开及惩办肇事人员。若中国政府自动办理，则此要求即不提出。”正在为对日交涉忙得焦头烂额的何应钦大为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宋哲元总惹乱子。6月19日，国民政府便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并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事前一无所知的宋哲元，看到免职令后颇为愕然。带着失望和怨恨，他连夜离开张家口，返回天津。察哈尔省主席一职，由他的副手、民政厅长秦德纯暂时代理。

6月23日晚上，土肥原贤二偕松井、高桥等来到北平府右街秦德纯的住所，与秦德纯开始正式谈判，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钟。土肥原贤二表面上态度谦和，但所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秦德纯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土肥原贤二无计可施，便冷笑着对秦德纯说：“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秦德纯气得脸色发青，当场吐血。接着，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摊牌：最迟到26日晚为止，察省事件必须解决，否则他将离平返回奉天。第二天一早，秦德纯一边派员挽留土肥原贤二，一边急电南京请示解决办法。热河方面的关东军为配合土肥原贤二，特于26日在古北口、南天门组织了有4000多人参加的实弹演习，北平形势骤紧。晚上，南京方面复电，答应日方要求。

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的日本使馆武官室完成签约手续，签署了《秦土协定》。此协定包括“昌平、延庆延长线之东，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



中央军退出平津华北，图中前立者为市政平津河北察哈尔的宋哲元将军。



宋哲元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南宫会面。他们本是老西北军的同事，此时都是华北的实力派。